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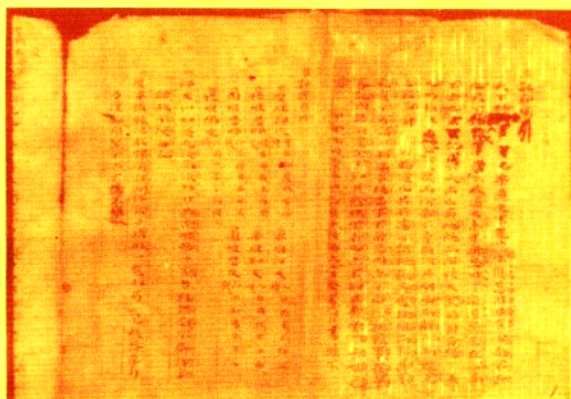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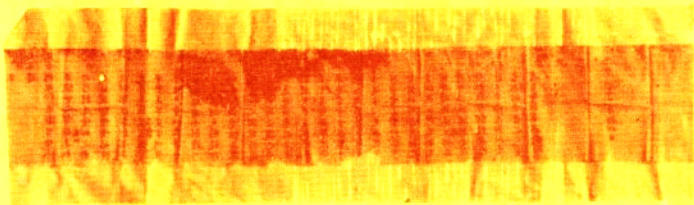
河南栲家珍品評

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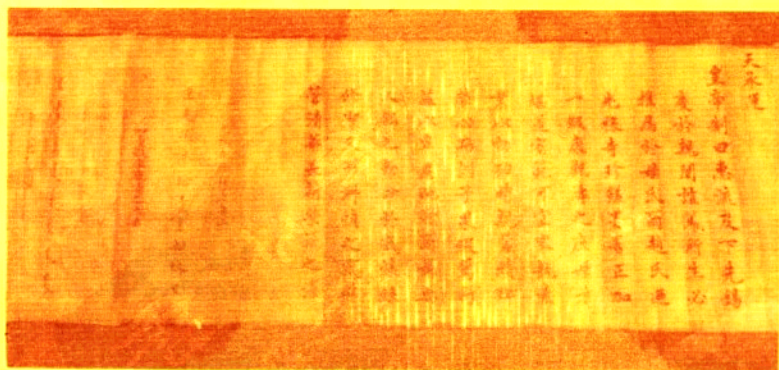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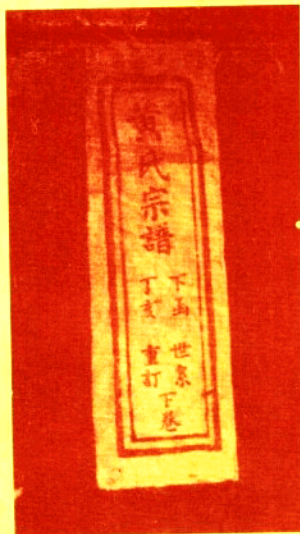
河南省檔案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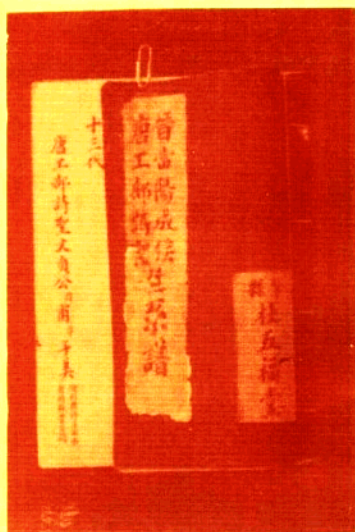


▲ 汝南县档案馆馆藏的明隆庆诰命
桐柏县档案馆馆藏的清道光敕命 ▼
杞县档案馆馆藏的明代《记难图》





◀ 河南省档案馆馆藏的明代《黄氏宗谱》



▲ 巩县档案馆收藏的杜甫世系谱

▲ 杞县档案馆馆藏的明代《杞乘》中杞县县界图



长葛县档案馆馆藏的慈禧御画碑刻拓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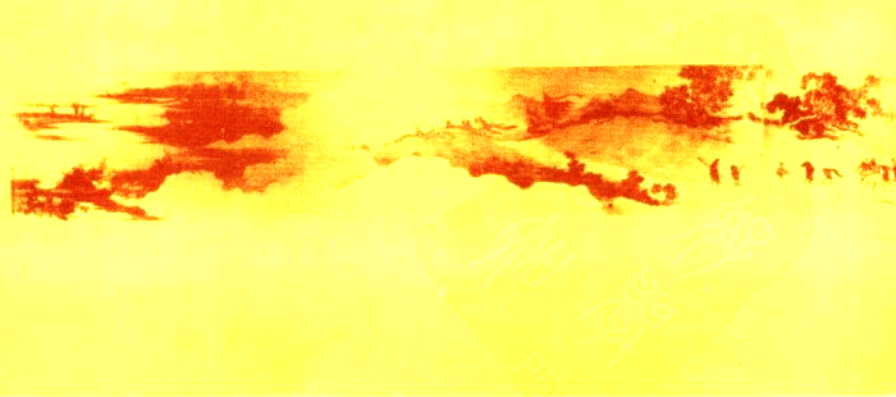
许昌县档案馆馆藏的清代功牌



▲ 唐代李世民签字碑(登封县档案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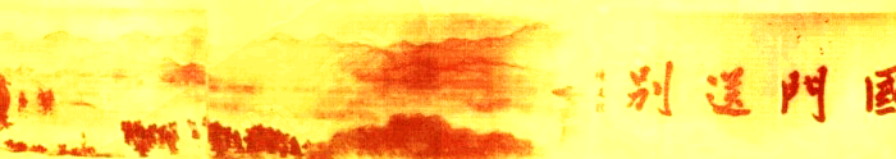
河南省档案馆馆藏的清康熙《开封府志》



河南省档案馆馆藏的清代《李文清公日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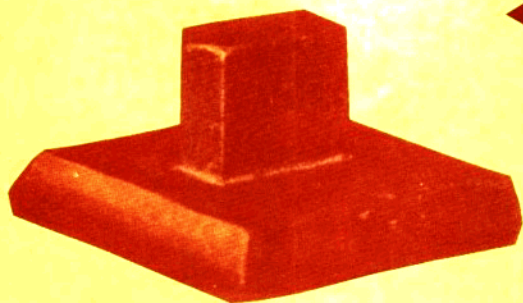


国门送别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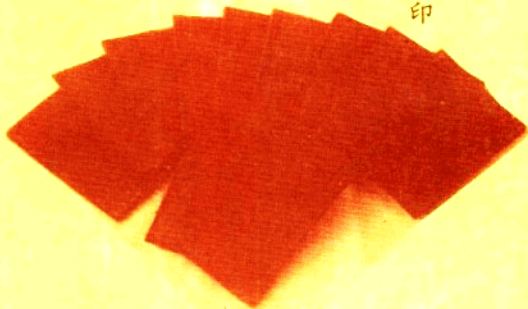


商丘县档案馆收藏的清康熙禹之鼎的《国门送别图》

汝州市档案馆馆藏的金代铜印



登封市档案馆馆藏的清康熙《说嵩》木刻原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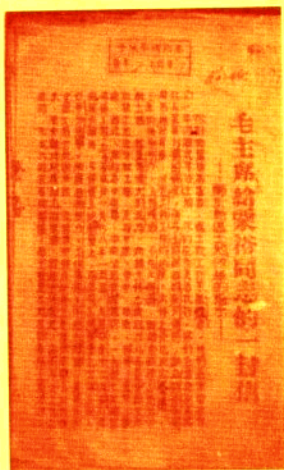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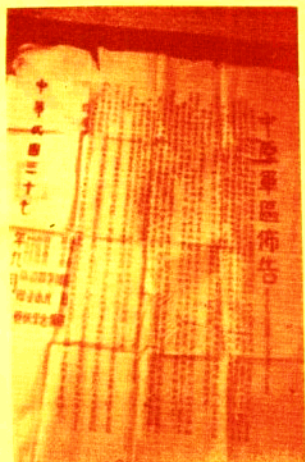


沈丘县档案馆收藏的明代董其昌手书《移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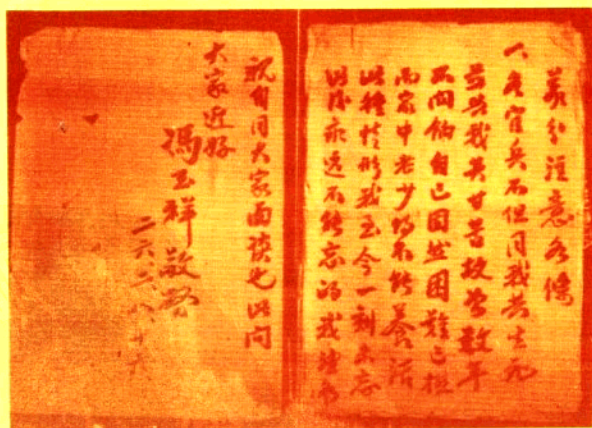




▲ 台兒莊大捷后李宗仁于台兒莊車站(开封市档案馆馆藏)



▲ 河南省档案馆馆藏的《毛主席给栗裕同志的一封信》及《中原军区布告》



河南省档案馆馆藏的冯玉祥手迹 ▲

序

王 毓

—

70年代英国一位名叫波波尔的哲学家提出一个很响亮的命题,认为当今世界除了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之外,还有一个“世界3”,而且这个“世界3”在未来社会发展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波波尔的所谓“世界3”,实际上就是我们通常说的“文献世界”,“信息社会”。不言而喻,文献和信息在未来社会的发展和科学技术进步中会起到巨大的作用,这是无容置疑的。但是波波尔把“世界3”和物质世界、精神世界并列,这种对世界的分类和划分,即第一世界为物质世界,第二世界为精神世界,第三世界为文献世界,这在哲学上是站不着脚的,“真理走过半步就变成了谬误”!

这个对世界的分类使我想起在近代自然科学早期发展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培根、圣西门、孔德等人的分类思想,它们也确有某些闪光的部分。以培根为例:培根正确地认识到人脑有三种能力:记忆能力、想象能力和判断能力,而这三种能力分别又和某些学科相关,比如培根认为历史是记忆

的科学；诗歌、艺术是想象的科学；哲学（包括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两部分）是判断的科学，由此推断出人类的大脑可以创造整个精神世界。由部分正确命题出发，进而推断出错误的结论，就是这类哲学家的通病。培根和波波尔都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条最根本原理：即存在决定意识，物质决定精神。马克思主义在解释世界的时候始终坚持唯物主义的—元论，反对唯心主义的多元论，反对从认识到认识，从精神到精神的唯心主义观点。

波波尔的“世界3”理论有一定影响，这不是说这个理论有什么独特的贡献，而是说它提出一个事实，即未来社会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对文献的研究、加工、整理、提取、应用、推广等有着至关重要的关系。这是已经为现代社会的发展和科技进步所证实了的。

二

中华民族是伟大的民族，仅就文献工作来说，起步之早，功绩之卓著，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都无与伦比。

“文献”一词，在我国两千多年前已经出现，《论语·八佾篇》记载孔子的话说：“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徵之矣。”孔子喟叹杞、宋文献“不足徵”，不能对历史进行证明。宋代学者朱熹注释时把“文”解释为典籍，把“献”解释为贤人，古代的学者研究历史讲究“徵文考献”，就是说要了解已往的历史，一方面取证于书本记载，一方面取证于知识和阅历

比较丰富的所谓“贤人”，取证于他们的记忆和对历史的评论。

“文献”的内涵发展到今天，“贤人”的含义已经消失，只保留典籍的含义。这是因为随着文字和各种书写、印刷、录制工具的出现，人们已经很容易把贤人头脑中的知识和记忆记录下来并长期保存下去。“贤人”便被各种典籍所代替，退出“文献”这个历史舞台。今天我们所称的文献是指记录在不同载体上的人类各种知识的通称。比如，从载体上分，可以区分为甲骨文献，金石、竹帛文献，纸质文献，各种声相和磁带、磁盘文献等；从内容上分，可以区分为社会科学文献，自然科学文献，应用技术文献等等。

(一)

我国古代从事文献工作的人被后人尊敬地称谓校讎学家、版本学家、训诂学家和目录学家。我国古籍浩繁，历代书籍在正史《艺文志》和《经籍志》中都有所反映。但这仅限于国家的藏书，而没有包括当时民间私人的藏书。汉代刘歆编定的我国第一部国家藏书目录《七略》收书 13219 卷。如果加上民间的私人藏书，其卷帙浩繁情况是可想而知的。这些书籍，在历代传抄传刻的过程中，难免要出现错误。一种书，本来就可能有几种甚至十几种质量不同的本子（宋元以后称版本），就抄本而论，我们今天能看到的最早最完整的《老子》帛书本是 1973 年 12 月在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帛书本《老子》同时出土两个本子，这两个本子从避讳方面

判断都是西汉初期或再早一些时期的抄本。两个本子不仅字体不同(一为篆体,一为隶体),而且在编次方面、在章段方面差异很大。如果和今天通行的本子进行比较,不同之处就更多了;至于刻本,从南宋尤袤《遂初堂书目》中所登录的版本看,一种书就有许多不同的刻本,如成都石经本、秘阁本、旧监本、京本、江西本、吉州本等。南宋岳珂刻《九经三传沿革例》时,其家塾中所藏不同版本,一种书竟存多达23种者。不同版本之间,不仅祖本不同,加之在传抄传刻中间出现的错字,漏字、漏段,衍文以及后人任意增删和伪托之词等,使大批古籍真假杂存、良莠不分,这种现象相当普遍,所以古人称“读书先宜校书”,“书不校不如不读”,就是针对这种情况说的。

我国古代的文献工作者治学态度是严肃认真的,方法是严谨的。他们每购得一本书,必求善本进行校勘,订正异同。凡发现有讹谬或不同的地方,便详细登录在本子上,注上校勘人的名字,这种经过校勘的本子才予收藏和研读。而称得上善本书的必须具备三个条件:一为足本(无缺卷,未删削),二为精本(精校、精注),三为旧本(旧刻、旧抄)。经过用善本书进行校勘的本子,也称善本。善本书是完善的本子,是经过校勘学家、藏书家进行校勘和鉴定之后的最终成果。清初的藏书家孙从添著《藏书纪要》,清末藏书家叶德辉著《藏书十约》对文献工作者的校勘和鉴定活动作了系统的记述,其态度之严肃,治学之严谨为我们树立了文献工作的典范。

(二)

古代的文献工作并不限于校勘版本的异同,其功劳卓著于后世的还是他们在“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方面的贡献。在这方面,汉代的刘向、刘歆父子,宋代的郑樵、晁公武、尤袤、陈振孙,清代的章学诚和纪昀等人贡献最大。

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校书工作是以刘向、刘歆父子为总负责的,历时二十余年。班固的《汉书艺文志》记载了这次校书的情况:

至成帝时,以书颇散亡,使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诏光禄大夫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太史令尹咸校术数;侍医李柱国校方技。每一书已,向辄条其篇目,撮其旨意,录而奏之。

这里说明了两件事。一、这次国家组织的校书活动各聘专才,请专家担任所熟悉的部分图书的校勘工作,分工合作。刘向校勘社会科学方面的图书(包括经、传、诸子和诗赋);任宏校兵书;尹咸校术数方面的图书;李柱国校方技方面的图书;而由刘向总其成,负责总编工作。第二,每校完一部书,由刘向写一篇“叙录”,主要介绍图书的内容,作者的情况,图书的价值,学术渊源和校勘过程等。后来把单篇的《叙录》集中成《别录》一书(早已失传)。今天我们从流传下来的仅有几种书的“叙录”中,可知刘向在校勘工作中做了这样几件事:一、广罗异本,仔细勘对,除其重复;二、校出脱简,订正讹文;三、确定书名,整理篇章,编定目次;四、

校勘完毕之后,为每一部书写出《叙录》。

经过这次校书,使汉代国家藏书从杂乱、重复、断简、伪讹、没有题目目录的混乱情况下整理出来,条别源流,系统归类。刘歆在《别录》的基础上,删繁就简,编为《七略》。《七略》为辑略、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术数略、方技略七部分。《七略》实际是把国家的藏书分为六大类,而辑略是综述学术流派的,放在七略之首,可以看作是总论篇。班固作《汉书》,又在《七略》的基础上写成《汉书艺文志》,历代史志方面的图书,多沿其例,开创图书分类的先河,给后代学术界和文献工作以极为深远的影响。

我国历史上最后一次大规模整理古籍是清乾隆时编纂《四库全书》。纪昀在整理古代文献方面的贡献,当首推编定《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清乾隆中期,设馆编修“四库全书”,纪昀与陆锡熊等为总编纂。西汉末年刘向、刘歆父子校书秘阁时,每校完一部书,刘向便写一篇记述作者历史、反映图书内容和校订情况的文字,称为《叙录》,把每篇《叙录》集中在一起成为《别录》。刘歆又在《别录》的基础上,系统分类编为《七略》。《别录》和《七略》充分发挥了辨章学术和考镜源流的作用,这是刘氏父子在学术上的巨大功绩。历史上可以和《别录》、《七略》媲美的是纪昀编写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提要》于经、史、子、集四部之首各冠以总序、条析源流。又于各小类之首(共四十三类)冠以小序。凡四部所收之书,各写提要一篇。提要首论作者行事,次论该书内容得

失，对于伪托、讹舛、漏脱等文字均以考辨。《提要》二百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很受后人推崇。纪昀另编有《四库全书简明目录》二十卷，和《提要》同行于世。

后人对纪昀的劳动给予很高评价。江藩在《汉学师录》中说：“公（指纪昀）于书无所不通，尤深汉《易》，大辟图书之谬。《四库全书提要》、《简明目录》，皆出公手。大而经史子集，以及医卜词曲之类，其评论抉奥阐幽，词明理正，识力在王仲宝、阮孝绪之上，可谓通儒矣。”阮元在纪昀《文集序》中更说：“凡六经传注之得失，诸史记载之异同，子集之支分派别，无不抉奥提纲，溯源彻委，所撰定《总目提要》，多至万余种。”这些评论基本上是正确的。当然，纪昀不可能一一为每部书写出评价和考证文字，因为一个人的才能和学识是有限的，即使是“通儒”也做不到。《提要》应该是集许多学者的智慧和集体劳动的成果，而纪昀只是总纂而已，过份夸大纪昀的才能和功劳也是不实际的。

（三）

我国古代文献工作者的另一成就是“部次甲乙，按类求书”。古籍文献检索两千多年来主要是按类索书。刘歆在《别录》的基础上，删繁就简，编定《七略》。《七略》除“辑略”为综论性质外，其余六略是按学术源流类分图书的。《七略》是我国最早的一部图书分类法。它把图书分为辑略、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术数略、方技略七部分。因为辑略是总论，所以实际是六部类分类法。汉代人直称为“六

略”。王充《论衡·对作篇》说：“六略之书，万三千篇”，就是指这部图书分类目录而言的。《七略》这部分分类目录早已佚亡，班固作《汉书艺文志》完全依照《七略》，今据《汉书艺文志》可见《七略》六大部类和三十八小类类序。这部分类法有两大特点，一是按学术渊源类分图书，一是根据当时图书实际情况，合其当合，分其当分，具有较高的科学性和实用价值。比如在汉代史部书籍很少，不能单独列类，于是把历史类著作归附于“六艺略”的“春秋”类里；诗赋本源于“六艺略”的“诗”类，但是汉代诗赋很发达，足以构成一个大类，于是又不拘泥于渊源，把诗赋单独列出来，成为“诗赋略”。再如，“六艺略”只应列易、书、诗、礼、乐、春秋六小类，但实际上在“六艺略”里除列上述六小类之外，又加入“论语”、“孝经”和小学。这是因为在汉代把习育“论语”、“孝经”和小学作为学童必修课程，是为进一步阅读“六经”打基础的，所以将这三门知识并入“六艺略”。上述分类原则既考虑到辨章学术、条析源流的科学性，又考虑到从图书的实际情况出发进行实用分类，这两条原则直到今天编制的各种文献分类方法仍继续采用着。

中国古代图书分类法的另一体系为今日仍在流行的四部分类法（在图书馆一般又加“丛书”一大部类，成为经、史、子、集、丛五部，丛部是沿张之洞的分类方法）。四部分类法溯源于魏晋之际。晋武帝时秘书监荀勖编《新簿》，分甲、乙、丙、丁四部总括群书，其代表顺序为经、子、史、集。东晋人李充把子部移后，把史部提前，就成了经、史、子、集的顺序。唐